

同仁堂供货商改判无罪 申请7000万国家赔偿 遭延期

据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去年11月,中国之声曾报道了原同仁堂供货商焦占军因错判而入狱,经过两年的牢狱生活和八年申冤路,终获无罪,随后申请高达近7000万元的国家赔偿,创造了刑事案件申请国家赔偿的最高纪录。

从2012年9月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焦占军的赔偿申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5个月,焦占军却没有拿到一分钱的赔偿,这让焦占军无法理解。7000万赔偿是否会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春节前夕,记者见到了住在北京一家小旅馆里的焦占军。这位十几年前在河北安国市声名显赫的大药商,如今不但生活拮据,还欠下一大笔外债。他说,自从被冤入狱,每年春节都有债主上门讨债。

焦占军:10年前,我的大楼是安国最豪华的大楼,酒店是最豪华的酒店。我开的车在安国是数一数二的好车,亲朋好友门庭若市;现在是门可罗雀,靠举债度日。每年法院都要逼债,越到过年法院越催得紧。

焦占军背负的这些债,起因都是2001年,焦占军被指控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一审被判刑。得知这一消息后,许多与他和他的企业有借款协议的机构和个人怕他无力偿还,纷纷向安国市人民法院起诉。深陷囹圄的焦占军无力抗辩,多个经济案件相继败诉。法院判决他给予借款单位和个人总计1000余万元的赔偿。2003年被改判缓刑后,焦占军开始了8年上访和申诉。尽管到2011年底,他彻底洗脱了税案的罪名,但这1000余万元赔偿的判决依然有效,已经家境破败的焦占军无力偿还。于是相继向安国市法院和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立案重申多起经济案件。

焦占军:这些欠债都是你们给我造成的。我这个公司经营情况非常好,这些债务根本不叫债务,如果我的公司在经营,我就欠不下债,都还了。

同时,焦占军还向法院申请高达近7000万元的国家赔偿。这个数字在我国国家赔偿史上还是从来没有过的天文数字。这一请求在法律界人士看来实现的难度极大。焦占军的代理律师王金才对于完全实现所有要求也不抱过大希望。

王金才:这个事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清的。因为他有这个请求,我们当律师的只能是善意地提示,哪些应该请求,哪些不应该请求。但是有些请求作为国家是应该赔偿的。

因为安国市法院拒绝赔偿如此大的数额,焦占军依法向其上级法院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申请作出赔偿决定。去年9月19日,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受理焦占军的申请。按照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应当自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决定。也就是说,到2012年的12月19日,法院就应该做出决定是否赔偿,赔偿多少。可是,焦占军直到12月20日仍没有收到来自法院的任何消息。直到他主动打电话给法官,才知道,决定被延期了。根据赔偿法,属于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但延期却没有任何书面通知,让焦占军觉得不合程序。

焦占军:要延期你应该通知我,要有文字性的通知。我问了你才通知我,那我要不问呢?我觉得司法机关法律程序应该完备才好。

记者试图按照焦占军给的电话联系当事法官,但电话一直未能接通。而现实是,申请提交了,媒体关注了,天价国家赔偿也让他出名了,可是几个月过去,他还是没有拿到一分钱。他的最低要求,要法院免除或者帮助偿还自己背负的千万债务的想法更是希望渺茫。他现在只等3月19日,延期截止日的到来,期待着法院的一纸裁决改变他的命运。

7000万国家赔偿,看上去很美,听上去挺震撼,但实现的希望又有多少?目前没有人知道。唯有以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相信人民法院会给出一个合理的裁决。(中国广播网)

银行员工“诈骗”用的是谁的信誉?

在业内人士看来,银行员工“个人”行为引发纠纷不断增加,将对银行内部控制和监管部门提出挑战。银行基层员工“出事”也与薪酬体系和激励机制有关,银行缺乏“忠诚文化”,银行不能把员工作为完成指标考核的机器,员工也不能把银行作为捞钱平台,双方不应该是“相互利用关系”。

上海陆家嘴冷风嗖嗖,位于浦东大道9号的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内则在经历一轮又一轮“沟通”。记者了解到,一位工行上海分行原普陀支行信贷科科长被指“利用职务之便借取多名客户资金高达千万元并卷款逃”,多名借款人前往上海分行进行交涉。

日前,工行上海分行正式回应称:“近日,本行收到反映,称本行原普陀支行员工刘遥(已离职),有以个人名义向他人借款的现象,因未按期还款而引发债务纠纷。我行对刘遥在本行工作期间经手的业务进行了全面核查,未发现与本行业务有关联情况,属于其个人行为。本行将积极配合警方调查此案。”

刘遥的“双重身份”

事实上,牵涉此次事件的除了工行的刘遥,还有温州银行上海分行前员工徐锋。一位杨姓借款人对记者透露,此次“交涉”涉及的资金总计5笔,共1280万元,其中最高为440万元。

“徐锋的前东家是工行,和刘遥是同事,我们都是徐锋在工行工作期间的老客户,之前已经与徐锋进行过多次合作,包括给贷款客户做‘过桥’以及月末提供存款等。”该位借款人对记者说。

据借款人向记者提供的书面资料:“2009年至去年12月初,温州银行上海分行客户经理徐锋以其银行贷款客户需要过桥资金为名,多次向多名受害人借款高达数千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所谓的“合作”借据中,徐锋为直接借款人,刘遥是担保人,徐锋要求借款人将资金打入一个在工行开立的名为“胡艳”的中间账户;换句话说,出面借款的一直是徐锋,刘遥表面上是担保人角色。

“东窗事发”发生在去年12月中旬。12月14日前,包括杨姓借款人在内的借款人资金先后到期,但徐锋和刘遥均称资金用于帮助银行客户垫付贷款之前的还款资金,而客户因征信报告有问题而暂时无法获得银行放款,因此还款时间需要延后。

2012年12月14日,上述杨姓小姐才被告知徐锋将这些资金转借给了刘遥,而刘遥并未将该笔资金如当初所说用于银行贷款“过桥”,而是将资金用于归还自身债务;至此,刘遥的“双重身份”被曝光,即“胡艳”账户的实际控制人早已为刘遥。

截至目前,借款人都已无法与徐锋和刘遥取得联系。据了解,刘遥已于去年年底向工行递交辞职呈,而徐锋同样也于去年底向温州银行上海分行递交辞职报告,目前两人均已不在两家银行供职。

温州银行上海分行有关人士则称,徐某辞职之时,并未发现其职务行为存在问题。



借款人:“要求工行负责”

据记者了解,徐锋已与一些借款人“合作”多年。以上述杨姓借款人而言,往年一般每年做4或5次,口头承诺的利息为千分之一点五或千分之一点八,“但之前都按时还款,并未出现逾期的情况。”该人士说。

另一位借款人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事后他们曾经联络上刘遥,据刘遥所说之所以会欠下巨款,是因为其之前在商品市场炒作白银期货而产生巨亏,被逼无奈借了几千万高利贷,继而开始采取各种方法筹集资金填补窟窿。但截至发稿,记者仍无法联系到刘遥本人,因此该种说法尚未得到最终确认。

据借款人提供的资料,徐锋与刘遥最终无法归还贷款之后曾透露:“自己只是走投无路才会用这种手段来向你们借钱,现在真的无力偿还。”随后,两人逐渐开始躲避债权人,并将其家人转移。

“我们事发后才知道,刘遥实际上已于2009年离婚,但离婚之后并未分居。”前述杨姓借款人对记者说,“比如朋友聚会,他们还是会一家三口一起出席,直到事发后我们找到刘遥的妻子,她才撇清关系说房产资产都在她名下,都与刘遥无关。”

该人士继续说:“我们从相关渠道获悉,普陀区公安曾在去年10月接到报案,称工行刘遥‘诈骗’借款人520万元资金无法归还;如果该消息属实,为何工行没有获得相关信息,刘遥还能在12月份继续向客户借款?”

“我们要追究工行监管失职,让员工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诈骗,”当问及借款人“交涉”诉求时,多位借款人说,“让工行对此事负责。”

据记者了解,借款人已向上海市公安局闸北分局经侦部门报案,案件进展仍为受理过程中,目前尚未立案。

而在近日借款人与工行上海分行高层进行沟通之时,警方人员同样到场,并表示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借助司法力量解决此事件。

有相关领域律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刘遥与徐锋之所以能从上述借款人处筹集资金,与其当时所拥有的银行工作人员身份不无关联,工行上海分行与温州银行上海分行均存在一定疏于

监管的责任。“但由于其借款的最终行为属于个人行为,所以很难定性银行存在连带责任。”该律师说。

叩问银行基层员工监管

银行基层员工或前基层员工“出事”已并非个案。

一位接近监管部门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今年肯定越来越多,去年从温州地区开始,今年开始波及其他地区,与债务链条有关。”

一段时间以来,华夏银行嘉定支行员工私卖高收益理财产品令客户巨亏、工行金华分行前员工“私卖”理财产品案件,以及浦发银行郑州分行二十世纪支行前副行长马益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等,均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银行的总分行制度造成分支机构责任大,但权力和调动资金的规模也非常大。”一家股份行相关人士对记者说,“在风险事件产生时,一些支行人员对分行瞒报、不报的现象确实存在。”

2012年,银监会专门下发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绩效考评监管指引》明确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绩效考评指标应包括五大类:合规经营类指标、风险管理类指标、经营效益类指标、发展转型类指标、社会责任类指标。

“在计算风险管理类指标时,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充分考虑考评对象风险分类、识别和计量的准确性。”该指引明确规定,“对于发生案件的考评对象,应当调低绩效考评等级。”这也就意味着,一旦发生案件,支行行长就可能“位子不保”。

“银行员工的8小时外监管确实是个很大问题。”上述接近监管部门人士称,目前银行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包括家访、家庭开放日、员工谈心、背对背诚信举报等,但总体来说手段方法仍然有限。

该人士继续说,银行基层员工犯错主要集中在三类:一是柜面操作员工,二是对公客户经理,三是理财客户经理。“对于柜面操作员工来说,由于技术控制手段加强,偷刷盗用客户卡的案例已越来越少。”他说,“目前出事最集中的是在后两类,信贷经理和理财客户经理相对自由、接触面广,客户资源又多,非常难以管理。”

(曹金玲 程亮亮)

中国“双反” 为何如此“难产”

日前商务部推迟了初裁,对于外界猜测推迟的原因是“春节期间部分流程未走完”,你可以说他是托辞,也可以说他很在理。春节放七天大假,你不能不让公务员过年,同时你春节加班可以不让申请方这些孩子过年,但你总不至于把欧美韩那么多应诉方的工作人员和代理律师之类拉在一起加班吧!

本应及时公布的“双反”初裁出现了一些问题,可以肯定其中涉及的问题较为严重,并非一两句话就能解释清楚,所以业内人士会产生如此巨大反响和热烈的讨论,商务部做出初裁推迟公布的真正原因究竟为何,这值得我们从更深层次加以剖析。

一方面:由于此次初裁涉及欧、美、韩三方多晶硅企业,收集资料、整理资料、审核资料等工作着实耗费很长时间,确实需要商务部加以思量。其间若出现问题势必会遭到欧美韩的强硬反击,春节期间部分流程尚未走完,这一借口表面看来可以接受。但此案影响重大,相关部门不太可能没有考虑到“春节档期”的问题。中国光伏企业“岌岌可危”,生存状况日益恶化,若简单地以春节休假为由置光伏企业生死存亡于不顾,相关部门的做法着实有待商榷。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可能存在某种顾忌,一旦中国宣布初裁结果,可能会引起欧美韩的极力报复,光伏企业的生存环境势必更加恶化,多数企业海外市场将彻底关闭。不过,即使中国政府“客气”有加,欧美韩方面也不会对中国企业手下留情,“双反”政策早已出台。中国光伏企业的生存状况短期内不会有所改变,即便遭受报复,国内光伏行业的整体状况也不会进一步恶化。

中国政府在国际贸易方面做得明显不足,在面对强势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兴起之时,并不能及时出台有效的应对举措,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根本得不到完全的保护。同时,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长期实施以守代攻的政策,主动出击制裁欧美国家的案例并不多见,对国际贸易相关法律的了解也不够详尽,这点还需要相关部门、有关企业重点加以关注。

中投顾问研究总监张砚霖指出,国家商务部何时出台、出台何种措施固然重要,但措施的出台能否真正帮助中国光伏企业解决实质性问题还有待重点考量。市场在外、技术在外是长期制约中国光伏企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国外市场运行态势非常明朗,中国方面的政策无法对外部环境造成很大冲击,“修炼内功”、开拓国内市场或将成为政府部门、光伏企业采取的有效举措。

(萧函)

29岁美籍印度裔

骗走投资移民美国的中国人亿万美元

就在中国农历春节前,美国联邦证券管理委员会(SEC)宣布,所谓“芝加哥会议中心兴建计划”(ACCC)是个大骗局,受骗人超过250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办理投资移民美国的中国人。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为降低失业率、增加就业率,特别推出所谓“EB-5计划”,鼓励外国人来美国投资,并可藉此申办绿卡。依照EB-5规定,凡在美国投资100万美元(若在失业率高于全美50%的地区,则投资50万美元即可),并为美国创造或保留十个就业机会,即可申请投资移民。

近年来,中国申请美国投资移民人数众多,每年1万个名额中,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士提出申请,因此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目标。美国联邦证券管理委员会指出,美籍印度裔塞思创建了芝加哥会议中心与芝加哥洲际区域中心信托两家公司,向250多位主要来自中国的投资者卖出1亿4500万美元股份,并收取了1100万美元的手续费。

塞思与他的公司欺骗中国投资者称,通



目前,总额高达1100万美元的“行政手续费”已被塞思花掉90%,其中还有250万美元被转到塞思在香港的私人账户内。美国联邦证券管理委员会日前除说明芝加哥会议中心兴建计划是个精心策划的欺诈之外,并宣布冻结塞思所骗来的投资移民金额1亿4500万美元。

帮助被骗中国人打官司的一位律师指出,目前全美国共有200余座大型区域中心或会议中心的开发兴建计划,希望有意办理投资移民的中国人要特别小心谨慎,第一步要先比对中英文的广告说明,看看内容是否一致,以免上当受骗。

(人民网)



海南亚洲制药生产
海南快克药业总经销